

在湖南隆回县江边村，几乎没人会把湖南师范大学副教授黄勇军刚建起的这座4层白墙黛瓦木窗房叫成“书院”。

黄勇军66岁的堂嫂朱聪坐在自家院门前的矮凳上，夸赞黄勇军兄弟在村里建起了这几年“最好的房子”。黄勇军在一旁和和气气地点头，也不纠正。

这场交谈的背景音，是朱聪香家4个孙子在房前屋后疯跑的打闹声。40岁的黄勇军笑嘻嘻跑到屋内劝架，并叮嘱朱聪香：等归与书院建成了，就让4个孩子每天放学后去书院做课后作业。

朱聪香爽快答应。她不知道，这个位于国家级贫困县隆回县花瑶少数民族聚居地的书院，并不是一般的“好房子”。上个月，归与书院开了一场“乡村书院与乡村振兴”论坛，来了近100位国内外乡建专家和从业者。

从功能设计来说，归与书院的确不大像书院，也就是进门后那间放着几排木条凳和方桌的屋子，有些旧式学堂的样子。有天窗的几间房屋，要留作大学生志愿者的宿舍；顶楼的木桌摆满了各类著作，是专门为学术论坛准备的。

推开书院大门，眼前是一片开阔的梯田，一些田地近年荒废了，一些田地正被返乡农民翻土复种金银花。通向书院的沥青碎石路是去年底刚建成的，建造者是村里两座大型采石场的负责人。

黄勇军总觉得，传统和现代仿佛在这里形成一种默契和对抗的共生。

今年1月，远在上海浦东的陆家嘴国际联合大学堂，在原有的专家工作站基础上又揭牌建立“中国乡村书院专家工作站”，首站落地湖南农村，要为当地孩子提供免费课程辅导、日常陪伴及素质教育，更希望把上海的经验带到乡村，把乡村的需求带到上海。

这项工作落到了归与书院头上。黄勇军觉得，正是书院代表的乡村文化自信才能够“把那些从泥里拔出来的东西摆在城市面前”。

“书院给了一个不置身事外的理由”

“我的书院就夹在两座采石场中间，现在采石场关了，采石场新修的2公里路成了孤零零的书院专道。”黄勇军把头探出车窗，表情复杂。

这次回村第一天，大哥黄勇民开车带黄勇军沿盘山公路上距书院最近的那座山头。年前机器的轰鸣声犹在耳边，而今只有一块块方正的大理石平铺在地，几台磨石器散落四处。今年新年之后，采石场出于生态环保要求被当地政府勒令关停。

从长远发展而言，这自然是好事，反过来倒成了黄勇军回乡建书院后的第一个坎。

这10年，村里的青壮年通过采石场解决了就业问题，每人月入六七千元。而采石场一关停，不少年轻人年后纷纷离乡务工，这和黄勇军“在有人气的地方建书院”的想法背道而驰。

这趟回村前，黄勇军接到县里领导的电话，县长祝贺书院落成，并请黄勇军帮忙做村民思想工作，希望大家支持关停采石场的决定。黄勇军爽快应下，可他也说，“想去先了解村民的立场和苦衷”。

不过，当黄勇军告诉他的村支书黄宇明时，遭到劝阻——“这个是个烫手山芋，村里人以为你是代表政府在跟他们了解情况，难免多想，日后你的书院怎么在村民中立足？”

黄勇军没听劝。年前，采石场关停的风声已在村里传开。黄勇军考虑到村民生计问题，提前向采石场负责人沟通了折中办法：采石场一边按照国家标准生产，一边出资进行生态恢复，并在当地建设旅游业等绿色产业，三四年后采石场主动停止生产，全线投入新产业。

这个办法曾在采石场和县政府两头获得初步共识，而年后一纸令下，采石场还是在省政府的的要求下坚决执行关停……

就在他和堂哥见面当晚，黄勇军恰巧遇到村里调研的负责采石场关停后续工作的副县长车茂。到了晚饭后，十几人围坐在黄勇军的朋友小伍家吃农家菜。两个方桌拼起的餐桌上，全是腊肉、红烧肉、鸡肉等家中现找食材，连蔬菜也来不及备上。

打头是温和的寒暄，黄勇军详细介绍书院未来可能要进行哪些尝试，车茂客气地微笑点头。

忽然话锋一转，黄勇军停下筷子，说起自己开展的入户调查，“我一侄女家的两个儿子都在采石场工作，一年下来共十几万元收入，现在采石场关了，如果他们留在老家可以去哪里维持生计？”

车茂的笑容收缩了，耐心解释采石场的关停势在必行。黄勇军当即表态全力配合关停，只是关心村民如何在关停后的生态恢复和后续开发中获益。

乡村书院实验

■本报记者 杨书源



3月24日书院国际论坛部分参会人员合影。

资料照片

黄勇军舒缓语气，谈起自己的构想：利用几处采石场废址，打造矿山精品旅游线路，比如“石头文化艺术村”、山地直升机培训观光基地、悬崖精品民宿酒店……

车茂毫不客气地质疑了许多工程上的可行性问题，众人陷入沉默……那段饭吃得漫长，菜几乎都没怎么动。

“或许没有归与书院的存在，我也就没有和车县长谈这件事的资格，因为我仅仅是一个局外人。书院给了我一个不置身事外的理由。”黄勇军说，这是他的乡村书院“第一课”。

“草台班子开的国际会议”

尽管书院给了黄勇军在村务谈判桌上说话的底气，但今年3月在书院开的那场国际论坛，仍被不少县里与会者笑称是“草台班子开的国际会议”。

因为建于海拔1000多米的山谷潮湿地带，不利于建筑工程推进，这个在自家宅基地上造起的书院，至今内部也未完工。

县里领导听说了这场有不少重磅嘉宾出席的国际论坛后，纷纷摇头——是否需要换个更加体面的地方开会？

黄勇军坚持书院就是最佳选址，他向县里领导打包票：大家是冲着我来这里的事情来的，即使是在晒谷场上开会，他们也会来。

春天的隆回依然湿冷，即使在夏季，有时也需围炉取暖。地图上显示，小沙江镇江边村距离隆回县城90公里，乘车需两个多小时。但黄勇军的预测应验了：门面奇小的论坛，居然来了近百人，远远超出邀请名单中的60多人。

会场没有投影幕布，嘉宾发言时内容被投影仪投射到白墙上，太阳光映在墙面，内容有些模糊。黄勇军找来毛毯匆忙往窗台上用锤子乒乒乓乓一阵敲打。椅子在会场成了稀罕物，村民们帮忙搬来椅子，却仍有不少人只能站着。

夏奕中早早来到现场，他是黄勇军三顾茅庐请来的名誉院长。这位隆回县的退休副县长几年前曾在隆回金银花过剩滞销时，拜访了中国工程院湖南籍院士印遇龙，研发了用金银花代替抗生素添加入家畜饲料添加剂和人类保健品的新门路。夏奕中层层报批，在上级领导的批准下成立了创业团队，从事金银花产品的深加工，当地农户因此获益。

“是他救活了隆回县的金银花产业。”黄勇军对此津津乐道，他想网罗更多有多乡土公益情怀的乡贤实干家来书院。

来自日本、英国等国的学者纷纷在书院发表演讲，两位中央美院的博士生“不请自来”，他们想在这里寻找更多乡土元素进行文创设计。

黄勇军也邀请黄宇明等几位乡亲代表参会，他们再三推辞后还是去了现场。黄宇明说什么也不愿上台发言，“在这些专家面前，没什么想说的”。

记者问黄宇明参会感受，他真诚回答：“有些什么理论和模式，没有听懂，正好屋子里有人没座位，就让座跑出去了幾次。”

黄勇军理想中的书院，实实在在是和当地人分不开的。这几年，他时常带着一双儿女回老家调研，一次回乡时，发现女儿比同岁的一年级小女孩多认识了许多字，很有感触。

若能凭借一己之力，让这些教育环境欠佳的农村孩子有个课后接受辅导的地方该多好。这是书院萌生的质朴原因。

要给书院取名时，黄勇军脑海里浮现出两个字——“归与”。它出自《论语》，“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大意是：回来吧，回来吧，故乡的孩子们志向远大，文采斐然，却不知如何约束。

不少人问过黄勇军，归与书院之于乡村的目标是什么。他答，最好的目标就是没有目标，要把一切对乡亲们有利的尝试都装进书院，但始终不能丢的是“教育”本色。

“从‘隔岸观火’变成‘引火烧身’”

和车茂进行了饭桌边的“唇枪舌剑”后，江边村采石场的僵局在次日一早迅速迎来转机。

今年3月隆回县新组建的自然资源局的工作人员一早给黄勇军打来电话，邀请他到局里与相关负责人、省里来的专家开一个矿山后续治理开发的可行性研讨会。

会议异常顺利，最终结果是隆回县自然资源局邀请黄勇军写一份小沙江镇矿山旅游和乡村振兴的初步规划，县里将在下一步的矿山改造治理中酌情采纳。

黄勇军却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村支书哥以外的任何村民，他召集了书院的高校志愿者见面。从本科生到博士生，近30人坐满了一间小教室。他在黑板上画了一个体系树状图，笼统解释，就是融入农户、政府、企业和高校的力量，汇集到以书院为平台的农村，形成闭环的自我发展体系。

记者困惑于这种沟通模式，他解释：“村民不是用耳朵来听的，而是用眼睛来看的，我从来不敢小看他们在乡村实践中得出的智慧。”他认为，村民们不需要一个高高在上的理论模型。

对于村民而言，最直接的是什么？或许就是帮助村里人卖货。前两个月，黄勇军忙着见一拨接做社区互联网服务平台和线下社区零售的人马。一位返乡开办大型豆制品和有机

1%，公司已减少缴纳增值税及附加税费近500万元。”企业财务总监樊华说道，“2019年增值税税率下调3%，公司增值税税负将进一步降低，其中增值税及附加税费将减少超过1500万元。”

这两天，弯弯月亮餐饮的财务何女士逢人就就说：“税务局的主动退税真不是说说而已！只接了个确认电话，多缴的钱就打进公司账上了！”原来，今年2月19日，上海发布关于小规模纳税人减征征收“六税两费”的规定，并明确从2019年1月1日起执行。其中影响最为广泛的税费莫过于城市建设维护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因为它们属于增值税的附加税费，涉及企业范围较广。“政策出前，我们已经完成了1月份的增值税申报，由此就发生了多缴税款的情况。这笔退税的准时到账，让我们深感政府服务的提升是实打实的！”

“融资难，融资贵”是企业的老大难问题。定位国际金融中心的海，正努力打破这一瓶颈。

三个100亿元！上海拿出了解决方案。——建立规模100亿元的上市公司纾困基金。该基金由市国资委牵头，国盛集团联合相关市属国企发起设立，基金首期规模50亿元，已正式投入运作。

——为优质中小民营企业提供信用贷款和担保贷款100亿元。目前，“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千家百亿信用担保融资计划”已为上千户企业发放信用贷款136亿元。新一轮信用融资计划也将启动，计划到2020年底前再为1000家中小企业提供信用和信用担保贷款100亿元。

——把现有50亿元规模的中小微企业政策性融资担保基金逐步扩大至100亿元。担保基金也已启动相关规范修订程序，将担保对象从中小企业扩大到民营大中型企业，提高担保风险容忍度。

一大波降成本的举措也正加紧落地实施：用地成本方面，弹性出让期、先租后让等用地方式启动推行；人工成本上，研究制定降低社保费率储备政策，将社保总费率降低在40%以下；物流成本方面，上港集团已制定港口作业搬移降费降低10%的方案……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追求更优的营商环境，正不断为上海高质量发展孕育新动能，构筑新优势。

蔬果产品的企业主和黄勇军一拍即合，主动建议：下次教授再来企业时，双方闭关谈2小时，敲定所有合作事宜。

黄勇军说：“我终于从那个‘隔岸观火’的人变成‘引火烧身’的人。”

黄勇军最早接触乡建是2003年非典时期，他还是中国政法大学政治学研二学生。当时，他和米莉在返乡时被家乡花瑶地区的民俗吸引，便壮胆去县里向时任县长钟义凡申请调研村庄政治文化。县里那时正着手开发花瑶旅游文化，就决定让这群学生放手一试。不过，工作人员在学生下村之前泼冷水：当地人懒惰，扶贫总是失败，比如你给他们带去了电视机、经济作物种子，不出3天，就会发现他们把扶贫物资拿去街上变卖换酒喝。

数月调研后，黄勇军他们发现这是因为生活在山里的花瑶人世代以狩猎为生，“见者有份”地分配猎物是其生活模式，这直接影响了他们对于耕作、储蓄的观念。

在同理心的驱使下，学生们获得花瑶人的认可。甚至在多年后黄勇军夫妇回到旺溪瀑布附近的瑶寨调研时，数百村民都朝天鸣枪致以最高礼遇。

“你只能顺应乡村的肌理，为村里人带来一种更好生活的可能性。”这是黄勇军在建书院时给自己定下的规矩。

两年前，黄勇军应邀去湖南株洲农村的“耕食书院”任职，展开了乡村书院的第一次尝试。经过一年实验后他发现，这种更多面向城市人群乡村体验的书院，能为乡村带来的还是太少。

一次在武汉大学举行的全国乡村书院会议上，黄勇军起身提出3个问题：首先，乡村书院应该教育的群体是谁，是很难负担学费的农村孩子还是已经教育过度的城市孩子；二是乡村书院除了教授传统文化，还应承担哪些社会功能；三是书院中现代文明的逻辑和传统文化应该如何对话。现场无人回答，甚至有人觉得这些问题“无需思考”。

黄勇军却说，他的这些设问，或许会在日后的归与书院“答案自现”。

“重要的是我是‘当地人’”

对村民来说，黄勇军的回归意味着村里多了一个能商量大事的人。一位当年的铁道兵因为弄丢退伍军人证，拿不到补助，希望黄勇军“出面问问”；朱聪香问起了她到长沙三甲医院看病“大概要多少检查费”……

每次和村里人聊天，黄勇军都下意识和他们保持同一水平面，有时蹲着，有时趴在矮凳上认真记录。

黄勇军脑海里时常浮现书院国际论坛的一个画面：一楼平台上，里外三层挤满了来看热闹的亲乡亲们。一位开手工作坊经营当地特产猪血丸子的老阿姨，头脑活络地把黄勇军拉到一旁说：“建军呀，你这儿来了那么多人，要不我拿点猪血丸子来卖吧。”黄勇军赶紧鼓励：“那好呀，这次没有提前准备，下次好好推一推你的猪血丸子。”

书院正在把村民面对外来的资本慢慢激活。黄勇军常与学生说起一个故事：本世纪初外来资本刚介入花瑶地区旅游开发时，出现了不少与当地的分歧。例如，花瑶人迎客时会请对方喝“拦门酒”，这本是好客礼节，却被景区改成“如果不喝完酒就要交钱”，这让花瑶人很不适，然而村民们在当时却没有和外界通过平等对话解决困难的自信。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黄海曾经撰文表示：“新乡贤文化作为一种‘软约束’‘软治理’，有利于健全乡村居民利益表达机制，营造新乡贤参与家乡建设的氛围，激发村民参与乡村事务的积极性，建设乡村共同体，并提高其凝聚力和自治能力。”

从书院建成那一刻起，黄勇军就觉得自己身份变成了“返乡创业农民工”。

在村里，无人知晓黄勇军“广场舞网红教授”的名声——几年前他和妻子米莉在长沙自费进行广场舞人群的社会学研究，名噪一时。

这对夫妻都喜欢这类特别接地气的研究。米莉的老家是陕西西洲县。眼下，夫妻俩即将赶赴西洲县，沟通乡村振兴和筹建乡村书院的计划。

黄勇军在归与书院找到了全身心参与其中的身份认同。“我觉得每个乡村书院都需要一位从本土走出去又回来的灵魂人物。”

“在乡土社会中成长起来的现代人，虽奔走于繁华都市的边缘，内心深处却始终隐藏着—个遥远的乡土情结。”当记者引用他所熟知的费孝通著作《乡土中国》，问他是否自我定义为“新乡贤”时，他笑着说：“定义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是‘当地人’。”

然而，黄勇军渴望全国复制的“归与”之路，悬而未决之事还有许多。比如，城镇化浪潮中，无数农村优秀人才涌向城市，每个乡村是否都能找到一位“黄勇军”？

好在他并不着急。“这十几年，我一直在往农村的池子里丢石头，这次总算是听到了回声。”

(上接第1版)

瑞伯职业技能培训(上海)公司是国内首家金融教育领域独资职业技能培训机构。企业在开办过程中体验了一把“一网通办”速度。公司总经理钟科说了一个“笑话”：“我们根本没料到，从递交材料到拿到批文，竟然只花了一周时间，打了我们一个‘措手不及’，反而从拿到批文到筹备开业花了很长时间。”

“上海的办证效率竟然这么高！”在日前开港的浦东国际人才港办事大厅，香格里拉集团驻店经理德国人乌尔里希，拿到了新办的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和居留许可。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居留许可审批可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这是浦东新区率先突破实现的中国首创，也是全市“一网通办”面向外国来沪人才的服务延伸。

如此高效率源自流程革命性再造。浦东新区区委办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处处长肖林说，人才港拓展了人工智能场景应用，将原来串联的海关体检、人社局工作许可和出入境居留许可三项流程改为并联。同时，审批时间减少60%，申请材料减少50%，使得审批效率提升40%。

船舶离港从2天变2小时！上海另一个数据“窗口”正吸引着世界银行的注意。服务企业28.9万，货物申报数401.6万，船舶申报数10.4万……在上海电子口岸大屏前，参访者可实时监控上海口岸业务数据、全球船舶坐标位置等信息。这是上海在全国率先推出的国际贸易单一窗口。通过这个窗口，企业可重复重复申报项目，简化申报流程，节省大量人力和时间成本。上海亿通总经理助理卫小明说，在单一窗口诞生后，以船舶进出港手续办理为例，从手工填制海关、边检等4套系统的1113项数据，到专人将出口岸许可证送达至船长，一般需要耗时2天。有了单一窗口，将数据全部电子化后，只需要不到2小时便可将电子出口岸许可证发送到船上。

破题：让政策活起来

一场会议开了三个半小时！为了“亲商、安商、留商、富商”，上海建立了政企合作圆桌会议制度，每次会议由分

强大引力 每天诞生1318户企业

管外资工作的副市长主持召开，政府各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收集并研究解决企业提出的问题。之前所说了三个半小时的，就是今年1月份的第一场会议，会上中国欧盟商会的10多家会员企业提出了25个问题，会后上海市商务委会同相关部门一个个跟进解决。据悉，今年这样的会议一共要开10场。

除了提升办事效率，“店小二”也在想尽办法，不断为企业发展给出上海方案——

小到—个标牌。作为国内首家外资独资医院，上海永远幸妇科医院总裁范煜回忆起一件小事：在日本，医疗机构不允许做广告，上海永远幸医院也遵循了这一惯例，通过每月举行说明会或咨询会的做法，向患者阐述医院的诊疗理念，依靠客户口碑传播来获得客源。只是医院所处的富特西一路比较偏僻，有些病人找不到入口。于是医院希望能在50米开外的主干道上设置引导牌。但问题来了，园区里都是企业，一家挂了招牌，每家企业都要挂怎么办？好在医院有自身的社会属性，上海自贸试验区相关部门反复论证，协调了十几个单位，最终在不违反市容规范的前提下，帮助永远幸挂上了招牌。

大到—个制度。作为上海自贸试验区内的研发型企业，上海远心医疗科技持有单道心电图记录仪技术，主要用于采集心电图信号后通过蓝牙传输至移动终端，但公司并不具备生产能力。以前如要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企业即使有技术，也必须走拿地、办厂、取得生产许可证这一条路，花费巨大不说，即使把厂建起来了，头一两年主要精力要放在生产许可证的申请上，工厂相当于空转，如果没有雄厚的资金基础，很难“守得云开见月明”。

这一情况在去年获得了改变，上海作为全国唯一试点区域，在上海自贸区率先试点医疗器械注册人制度，实现了医疗器械产品注册和生产许可的“解绑”。改革后，远心医疗只要申请成为新产品医疗器械注册证的注册人，就可以委托上海微创集团生产型企业生产样品及成品，最终后者通过严格审评，获得生产许可。去年初远心医疗的单道心电图记录仪上市，时间比原先缩短了82%。

还有各种各样的难题。就在去年11月初，

金桥开发区的沃尔沃中国总部收到了中水8局尼日利亚宗格鲁水电站项目购买挖掘机的首付款，首次走通了离岸贸易的全流程。从此以后，他们再也不用眼睁睁地看着每年数亿元的营业额落到海外。

原来，按照我国海关监管制度的规定，沃尔沃中国总部只能从事进出口贸易，却无法开展货物不报关入境的离岸贸易。而如果货物不经国内口岸，直接由企业的境外生产厂商销售或租赁给境外客户，海关因看不到货物，不能提供相关进出单据，也就无法以传统方式证明货权；银行方面担心没有按章审验存在不合规风险，也不敢轻易尝试，造成企业无法收付汇和在国内开展资金结算。为此，上海自贸区金桥管委会多次与海关、央行、外管局等部门沟通，开发建设信息平台，开出“白名单”，破解了这一跨境结算难题。目前，企业正凭借这项制度优势，源源不断地开拓“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离岸贸易业务。

面对企业的痛点、堵点、难点，上海的“店小二”们总在尝试“有条件解决、没条件创造条件解决”，这样创新地为企业排忧解难，正慢慢成为他们的新特质。

降负：让企业强起来

1000亿元！今年上海将实现超过这一数字的减税降费。

大规模减税降费，就是要用政府收入的“减”换取企业效益的“增”，以政府财政的“紧”换取企业活力的“强”。说到减税，就不能不提7年前起自上海的“营改增”。数据显示，2012年—2017年“营改增”试点的五年，上海累计为企业减税3248亿元。受营改增外溢效应影响，上海现代服务业集聚效应凸显，能级不断提升。

改革向纵深推进。伴随营改增全面铺开，这两年税率连续下调，企业获得感满满。蒂森克虏伯电梯(上海)公司是一家德资企业，主要产品为电梯及相关部件。增值税虽然是价外税，但影响现金流的变化，税率大幅下调会使公司增值税税负降低，缴纳增值税及附加税费减少，现金流出变少，利润总额增加。“去年税率下调了



“誓与密码共存亡”董健民

据新华社天津电(记者 周润健)

在天津市静海区东南部，静静地坐落着一个叫刘祥庄村的美丽村庄。宽阔的马路，整洁的街道，洋气的楼房，处处是一幅幅幸福美丽的新画卷。

刘祥庄村隶属静海区董健民烈士的家乡，她在这里出生、求学，并走上革命的道路。

董健民，女，1923年出生于河北省静海县(今属天津市)。1939年春，董健民在她的祖父、中共地下党员董秋斯的引导下，与两个姐姐一起渡海南下，辗转参加到抗日救国的行列中。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1年，董健民调到中共中央社会部机要科任机要员。1942年，她在机要科一起工作、志同道合的亲密战友、共产党员钟琪结婚。在喜庆的日子里，他俩发誓，为了千百万人能够得到解放，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宁可牺牲自己的性命，也决不泄露党的机密，“誓与密码共存亡”。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董健民和钟琪夫妇被党组织派遣到东北局工作。1946年，他们带着刚刚两岁的孩子，化装乘船由海路经大连赴东北。当他们乘坐的商船驶进渤海水域时，由于叛徒告密，遭到国民党军舰拦截，炮弹击中了他们乘坐的商船，穷凶极恶的国民党军警要登船检查、搜捕共产党员。

面对突如其来的险情，董健民、钟琪夫妇冷静地分析了险恶处境，迅速作出了抉择：宁可牺牲全家人的生命，也决不能让党的机密落入敌人手中。他们把携带的密件紧紧贴在胸前，一家三口紧紧抱在一起，毅然跳进了波涛滚滚的大海，壮烈牺牲。董健民牺牲时年仅23岁。

今年68岁的董治海是董健民的侄子，他称董健民为三姑。“三姑牺牲时我还没出生，但她的事迹长辈们经常和我们提起，她是我们的骄傲。”董治海说，三姑的革命情怀一直激励着我们。我经常对自己的孩子说，作为她的后人，一定要无愧于心。

“董健民是我的远房姑姑，她的英勇事迹村里人几乎都知道。我们引以为傲的同时，也用她的革命精神教育子孙后代。”刘祥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董兰清说。

